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納中華入臺灣的1949創傷癥候，與發明新臺灣的可能：讀《1949禮讚》

The Trauma Symptoms of accommodating Chinese Culture in Taiwa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The New Taiwan": The Review of The Salute of 1949

doi:10.6752/JCS.201603_(22).0013

文化研究, (22), 201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2), 2016

作者/Author: 顏訥(Na Yen)

頁數/Page: 242-25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6/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3_\(22\).0013](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3_(22).001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納中華入臺灣的1949創傷癥候，
與發明新臺灣的可能：讀《1949禮讚》
The Trauma Symptoms of accommodating Chinese Culture in
Taiwa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The New Taiwan": The Review of *The Salute of 1949*

顏 訥*
Na, Yen

前言：新臺灣烏有史如何可能？

直接進入《1949禮讚》(2015)之前，請容我兜個圈子，先提出香港作家陳冠中同是2015年出版的新中國烏有史小說《建豐二年》(2015)作為對照系。陳冠中企圖以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經驗，將時間倒回到關鍵的1949，拋出一個大假設：如果國民黨沒有敗退臺灣，順利統治中國的話呢？顯然，1949後的臺灣經驗相對於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讓陳冠中對國民黨的統治術能借力使力，構造一種新歷史想像。他的新中國烏有史，即使民權方面不甚滿意，但在民生、經濟、國際外交、文化思想、藝術發展上，卻比現實世界中的中國共產黨統治，來得更美好富強。黃錦樹教授在〈那麼大的如果，那麼小的拼圖〉中，點出陳冠中在小說中給出那麼巨大的「如果」，實際寫起來，還是被真實歷史的參照企圖給綁住了，並未顧慮到臺灣島在地理疆界上幅員小，加上國民黨作為外來政權，沒有地方權力結構清理不開的牽絆，同樣的作法照搬到中國土地上，土地改革、清除共產勢力有辦法順利進行嗎（黃錦樹 2015）？

有趣的是，香港小說家陳冠中的烏有史，與臺灣學者楊儒賓教授對於臺灣在1949後，國民黨政權如果沒有來臺的那個「如果」，恰好有著相近的假設：如果國共沒有分裂，國民黨政權沒有撤退至臺灣，那麼，臺灣現今在文

* 顏訥，國立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電子信箱：nicksophia2002@gmail.com

化上的位置大概還是邊陲小島。

也就是從這一個假設出發，從文化發展的意義上來看，回溯1949年，楊教授便能另闢蹊徑，得出比較正面的意義。國民黨統治雖然在島上劃下痛苦的傷痕，卻也同時帶來豐富的中華文化底蘊，在人文學科建制、文化機構創立、新儒家哲學扎根等方面，接合島上原有的漢文化，讓臺灣加速成爲中華文化的持護者，被納入美蘇冷戰結構之中，使它沒有被中共文革破壞殆盡。此外，中華民國—臺灣一體化，直接讓臺灣成爲主權獨立的國家，也是1949禮讚中提出的1949年之積極意涵。

1949年有其良善的價值，文化、思想、藝術、教育、戶政公務系統南來，乃至楊儒賓教授在書中提到，新竹中學校長在二二八前夕，外省人受攻擊的事件中，如何受到本省學生自發性保護，顯示畫出一條超越國民黨政體壓迫、「本省—外省」二元對立論之外的史觀，確有可能。然而，從這裡再往下走，我還是想先停一停，站回《建豐二年》所拋出的那個巨大的「如果」陰影之下，提出幾個疑惑：國民黨沒有撤退到臺灣，臺灣還只是邊陲小島的假設，是否站在中國作爲中心（文化、經濟、政治中心）的對照基準上來推想？必然先有一個美善而珍貴的中華文化在前，才能導出一個缺乏「正統中華文化」的臺灣發展將不夠文明？如果我是一個小說家，回到臺灣島內發展史來看的話，要寫一本新臺灣烏有史應該會長成什麼樣子？是不是一如楊教授在書中所言：「臺灣雖曾出現過不少優秀的學者、詩人、畫家、畫師，但其作用基本上都是島內的，影響沒波及全國。三百年的臺灣極少出現過全國性的文化巨人，也沒有產生過全國性影響的學派、畫派、詩派、書派。」（楊儒賓 2015：37-38）2015年的新臺灣烏有史，臺灣人還在等待島內文化巨人，而文化巨人不來嗎？這裡又產生一個弔詭的對照，臺灣歷史三百年間，沒有出過影響「全國」的文化人、藝術家，這個全國，指的應當就是擴及中國的文化場域。然而，若依循臺灣島內產生的學派、畫派、詩派、書派自己的發展脈絡呢？文學、藝術、思想經典化，仍舊必須先在中國文化場域取得位置，才能算是經典嗎？

如果1949國民黨政府沒有來，如果再給臺灣知識分子多一點時間，能夠長出什麼樣的政治、經濟、文化特有種呢？是否臺灣在東亞文化圈就不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發現，這個「如果」，比想像新中國更難回答。

《建豐二年》有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統治史可以參照，而新臺灣烏有史則

因1949年以後被遮蔽的史料太多，讓時間更難以回返，未來更難以構造。那些因為1949年後國民黨「去日本化一再中國化」，推行國語政策、文化菁英階層因政權南遷改變而失語，注定有很長一段時間跌出臺灣主流文化系統之外的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被延宕而斷裂的知識系譜該如何想像？

那麼大的「如果」，卻只有那麼少的材料來拼圖。

提問一：被遮蔽的臺灣史完全出土了嗎？

因此，我還是得回到最基本的問題：當我們評價今日臺灣的知識系譜，因1949年後「再中國化」政策而被遮蔽的臺灣史完全出土了嗎？1949的災難在今天能夠向上提升了嗎？2015年的臺灣，是否已經進入後中國化與後本土化的辯證發展階段？

這幾個問題不是我的研究專長，不敢斷言。但就我這幾年的親身感受與觀察，「臺灣」與「本土意識」兩種符碼背後所指涉的意義，還處於隨時變動與重構的歷程中，與「中華民國」在政治與文化上統治臺灣的合法性不斷產生辯證關係，體質尚且脆弱。而年輕的一代，正在學習取得參與共構國族認同的權力與方法。因此，我認為，此刻臺灣已經進入「後中國化、後本土化」的說法，值得商榷。

《1949禮讚》出版的2015年，臺灣內部前後經歷了反黑箱服貿、反課綱微調等具有抵抗中國併吞，維護臺灣主體性意義的抗爭事件，運動訴求卻不能獲得執政者適切回應。因此，2015年，也正是臺灣年輕人警覺中國勢力從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入侵的關鍵性一年。另一方面，1949年以後，以代表中國正統政權作為保護傘，被美國納入冷戰結構中夾縫求存的「中華民國」，似乎漸漸失去了保護作用，反而因憲法中國土疆界問題與中共夾纏不清。憲政改革聲音再起，也同時要求清理國民黨菁英過去汲取的獨占性經濟資源。此時提出1949年與「中華民國」所帶來的積極意義，而不談它背後牽扯的歷史傷口，是否是很好的時間點呢？進一步說，「納中華入臺灣」主要想溝通、說服的對象，又是哪一個群體呢？

1987年解嚴以後，臺灣本土化之路走得艱困緩慢，無論知識界或者非知識界，投入「什麼是臺灣人？什麼是臺灣文化？臺灣要往哪裡去？」的資源

還不夠多。對於1949年國民黨統治帶來的痛苦與災難，傷口還在隱隱作痛，因為清創的努力不夠深入，過去的加害者有許多是今日的統治者，轉型正義的方向還曖昧不明，讓歷史的爛瘡沒辦法結痂，只能停留在蓋著紗布就以為痊癒的尷尬境地。至今，誰該為1949年後的災難負責？災難真的被全面而深入地反省了嗎？

因此，我認為站在2016年的臺灣，回望1949年積極意義的背面，也必定黏著它的負面教訓，二者尚不能分離。因為被掩埋的東西實在太多，而清理的時間實在太少。

戰後，葉榮鐘（作家，1900-1978）回憶，他們那一代出生在割臺以後，未曾踏入中國國土，也無血族姻親，祖國觀念與民族意識其實是被日本人歧視與欺凌壓迫所激發出來。臺灣的中國認同與臺灣意識，並非本質性的存在，而是不斷解構、重構的過程。除了上述隱含反併吞訴求的運動，刺激臺灣人重思臺灣主體性之外；2015年習馬會，「中華民國」在會議上成爲不能說出口的祕密，反而讓習近平與背後的中國政權更加巨大，更激發出新一代臺灣人新的臺灣意識。在這樣特殊的歷史語境中，面對臺灣島在國際強權角力中如何求生的惶惑感，70年代黨外抗爭人士進入體制內之後，左支右絀，改革有限。對年輕一代臺灣人而言，我們才剛開始摸索新的抗爭、參與政治的方式，對公民的責任有了新的思考。

1945年以後，國民黨在臺灣全面實施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以至於「臺灣史」、「臺灣研究」在1970年代以前，被驅趕至學院圍牆以外。1972年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展開「濁大計畫」，才標定臺灣歷史人類學研究轉向（莫達明 2010：55-70）。特別是國民黨官方歷史總是努力掩蓋1920年以後，臺灣島內自治文化發展，以及政治社會運動的多面性，即使讀《認識臺灣》¹長大的一代，對臺灣史的認識仍舊簡化。

過去，我並不清楚荷蘭時期傳教士將現代化帶入原住民部落，與原住民傳統文化間的衝撞應該如何評價？爲什麼原住民族史永遠停留在史前時代與荷治時期，往後的歷史則在歷史教科書之內消音？

我也不清楚日治時期臺灣抗日運動有不同階段，而不同抗日團體的

1 國立編譯館所編撰的國民中學教科書。

國族認同是如此複雜。既有楊儒賓教授在《1949禮讚》中，提到的林獻堂與樂社詩人群等，是懷有祖國想像的「祖國派」、「待機派」，也有主張建立「臺灣共和國」的臺共、農組、新文協等「臺灣革命派」，他們對國族、民族、臺灣獨立的想像並不相同（李筱峰 2007：19-36）。

我更不清楚臺灣文化與閩南文化的承接關係，如何表現在民間文學與歌謠上。原來臺灣民間故事除了被漳州、泉州移民帶過來以外，也有臺灣本地發生、形成獨特的內容（施懿琳等 2013：81-116）。

原來，「星期」的概念是荷蘭人帶來，時、分、秒連結到的守時觀念則是日本教育修身讀本的產物（駱芬美 2014）。

原來，左右兩派對峙的冷戰格局中，民主主義在臺灣還有不同意識形態的辯證。

還有，1924年臺灣新舊文學論戰如何發生？為什麼我們的文學史談新舊文學只討論五四？以及，臺灣「多語性」所內化的跨文化世界觀之特殊性，如何在日治時代的翻譯工程中，透過日語翻譯成傳統漢文，日語翻譯成臺灣話文？甚至到後期由英語、中文等多國語言翻譯成日文，其知識系譜複雜多元，能直接與世界接軌。例如，賴和在日本求學期間，就早魯迅四年用傳統漢文翻譯尼采（鄧慧恩 2009）。而2015年上映的紀錄片《日曜日散步者》（2015），拍攝對象便是1930年代就將超現實主義引進臺灣、並且實踐於創作的臺南詩人群「風車詩社」，較50年代譯介現代主義作品的南渡詩人群更早。顯現出臺灣在不同時期，由不同途徑接觸世界哲學、文藝、運動思潮、生活習慣，發展出複雜、獨特的文化內涵。進一步說，由於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推行相異於西歐、特別注重教育機會均等主義的「同化」政策，日語教育透過初等教育而普及（陳培豐 2006）。如此一來，日語內化成日治臺籍知識分子認識世界的通道，比較沒有中國知識分子處在中文／外文轉化的焦慮（鄧慧恩 2009）。

更重要的是，二次大戰結束後，臺灣人立基於啓蒙、反叛權威，受古典啓發，同時獻身未來之上，追求現代性，第一波民主與自治運動並非從中華民國—臺灣一體化之後才展開，反而較第二波抵抗蔣介石權威的民主運動，更具有對知識、經濟、政治、性別等各種議題的關懷（陳翠蓮 2013）。

即使如此，直到2015年，104歷史、國文課綱微調的爭議，還是依循去臺

灣化、再中國化的方向蠻幹，可見70年代以後臺灣史學者的努力，在基本教育場域中的掙扎還沒塵埃落定，隨時都有可能隨著統治者的認同模塑工程而翻盤。

我們在臺灣談歷史，能否先把承續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重擔卸下，然後挑戰「中國歷史」連續性？

所以，在被遮蔽的臺灣史因為國民黨政權壓制，並未成為大眾常備知識之前，要站在什麼角度談中華文化在臺灣以及「南渡」，會比較公允？楊教授提出「一九四九是個奇妙的數字，臺灣人民將它從苦痛的記憶轉化為傲人的記憶」（楊儒賓 2015：41），如今苦痛還在，還有許多真相未明，關於1949的評價，歷史真的會不證自明嗎？

提問二：以儒學作為基礎的漢華文化的發話對象？

縱觀《1949禮讚》，雖然是不同時空所發言、撰寫、集結而成的發言稿與文稿；但是，從不同篇章之間，或許還可以尋出楊儒賓教授提出的幾個重要關鍵字：儒學、漢華文化與納中華入臺灣，三者互涉，便是以儒學為基礎的漢華文化，用納中華入臺灣的態度追尋文化共融。楊教授的用心，是要標舉未經文革摧毀，隨國民黨政府一同遷徙至臺灣，因南渡文化菁英而留存下來的中國文化，加上中華民國立國制憲時所建立的民主政體，作為優勢，取得在政治、經濟之外足以與中共政權抗衡的力道。特別是中國面對全球化與現代化，近來重新提倡孔子學說，主張「新時代通三統」，將孔子傳統、毛澤東傳統與鄧小平傳統視為中國歷史文明的連續傳統，臺灣新儒家對此勢必不能不儆醒。

不過，考慮到這樣的說法能否有效傳播並且被接受，我想進一步追問：以儒學作為基礎的漢華文化，設定的溝通對象是誰呢？是中國？抑或是臺灣內部？

若後者與前者同樣重要的話，那麼，現今臺灣人普遍對儒學的認識，還是來自中學教育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無論選材、教法、考題，皆不談新儒家開展出的良知坎陷、民主與科學，也少讓學生在誦讀過程中練習思辨，更沒有找出與當代社會對話的通道，忽視學生心智年齡與人格發展所需，使得下一代對儒學的認知普遍是守舊與僵化的代表。如果儒學能成為臺

灣抵抗中國文化侵吞，反過來彰顯臺灣影響力的思想，那麼，它必須先與更多臺灣人對話，直面當代議題。

關於儒家的當代性問題，已經有許多學者努力過，楊儒賓教授是領先者。然而，儒學與當代人存在感的連結，這套論述要能走出高等學院的圍牆，中學教育是主要戰場。如何在中學教育中適應新的教育理念、教學方法，以新的話語行銷、解釋自己？這是最大的挑戰。特別是「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在60年代建制之初，獨立於國文科之外，成為必修科目的原因，一方面是四書經典化過程中，在南宋後成為儒釋道共同接受的正統典籍；另一方面卻也是冷戰結構中，鞏固中國文化認同的特殊產物。於是，在臺灣認同重構的過程中，2006年、2011年「中國／華文化基本教材」存廢與更名，其「文化本質主義」、「中華文化民族主義」的內涵（陳弱水 2011），以及理所當然占有中學思想教育的主導性位置，如今重新受到檢視與挑戰，也是在所難免。

或許，我們還可以追問下去：當代臺灣，還需要標舉一個主導性的思想或文化嗎？

何乏筆先生在討論1949年的意義與臺灣跨文化潛力時，曾提到「漢華文化」如何擺脫其背後牽累的各种歷史業障，從內部將民國資產轉化成新局？（何乏筆 2009：18-20），使我反過來思索「漢華文化」的提出，是否真能統攝臺灣多重層的文化內容？依我粗淺的觀察，恐怕眼下情況並不那麼理所當然。

細想「漢字—漢語—漢文化」背後尚未被清理乾淨的「歷史業障」，包括過去從漢族中心主義出發制定的各種政策，讓原住民族歷史、文化、語言有很長一段時間在臺灣成為真空。因此，楊儒賓教授敘述的「漢文化生活樣式既是我族自我凝聚，也是區別他我最方便的參照點」（楊儒賓 2015：104），反過來說，其實也是過去漢民族用來排拒原住民族文化，區別他我的態度。如此一來，漢文化意識，就不會只是文化觀念，而也有政治意義，恐怕會減損楊教授原先主張的美意。

80年代才開始的原運，走到今日也尚有許多未解的議題。遠的不說，新政府今年520就職典禮上，由紙風車劇團開場的表演，就以西方文化「改變了許多原住民們原本粗獷而草莽的習俗」來詮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政權對原住民文化的影響，足見看似已經平等開放的臺灣社會，重建原民史觀仍是道阻且長。因此，若以「漢華文化」作為號召，也不能忽略漢文化移民史，在島上取得文化主導位置時，使用的一連串暴力、不正當之奪取手段。因

此，當我們思考臺灣國族認同、文化建構的時候，應該避免以漢人爲中心，取消原住民族的話語權。

除了原住民族史觀應該被慎重對待之外，臺灣社會雖然主要由漢族移民組成，但「若深究內部結構，會發現其中包含具有不同歷史淵源與性格的集團，他們之間的界線交錯重疊」（若林正丈 2014：31），因而被若林正丈稱爲「多重『族群』社會」。針對臺灣歷史上不同族群不斷重組，至今更有東南亞新住民因爲跨國工作、婚姻而大量移入的現象，如果用漢華文化作爲新臺灣文化的代稱，似乎未能表達多重族群社會的特性。而「華」，無論作爲語言或政體，在歷史上，還曾是用來弭平多語性、多元文化發展的符碼。民國初建，發明中華民族，主張五族共合，雖然在當時是針對滿族滅明朝，建立清國之種族革命，達到階段性目標，今日看來卻吞併了差異性，又與中共一貫以「打斷骨頭連著筋」的中華民族兼併策略難分難捨，如何能賦予它新的意義？恐怕還需要更多論述。

所以，回到最初的問題：當代臺灣，還需要標舉一個主導性的思想或文化嗎？或者換一種問法：當代臺灣，是否有一套論述、思想、理論，足夠回應各種正在發生且亟需被討論、解決的議題呢？而以儒學爲根基的漢華文化，如何與多元成家、厭女現象、居住權、分配正義、動物保育、新住民文化認同與衝突等議題對話？「漢」與「華」背後牽連的歷史業障，會否削弱了與不同階層、族群、性別溝通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面對日前全國哲學系教授呼籲新政府，在107課綱中加入「哲學推理」、「批判思考」，避免高中生誤解哲學。在基礎思想教育中占有優勢，卻逐步與當代社會脫節的儒學教育，又該如何確立自身價值？

小結：中華如何納入臺灣？

以同情理解原則閱讀《1949禮讚》，推想楊儒賓教授提出「納中華入臺灣」的說法，是將「中華」去政治、去意識形態，穩固「中國文化在臺灣」的位置，盼能轉化爲內部文化思想資源，避免臺灣文化民族主義走到極端時，會被排除。因此，對楊儒賓教授而言，「中華」是有悠長文化奠基的中華，是建國制憲時能接續傳統，同時開創新體的中華，而這樣的中華，應該在臺灣政權確立的進程中被納入。楊儒賓教授立意良好，因爲，無論採取

哪一種臺灣獨立的策略，完全將中國文化從骨頭上刮除乾淨，必定是極為浩大艱困的工程。此外，哪一種程度上的刮除也需要釐清，是語言、文字、習俗、思想、倫理關係還是制度？盡數排去後剩下什麼？這都是難解的問題。因此，楊教授主張「『中華文化』會擺落民族主義，它的面貌會愈來愈本土化，同時也愈來愈國際化」（楊儒賓 2015：151）。

但是，在此時提出納中華入臺灣，欲將「中華」去政治化的最大困難，可能還是誤判了「臺灣意識」發展的進程。在這個基礎上，我認為，最根本的問題是：楊儒賓教授的中華想像，與我們今日想像中華同枝連氣嗎？還是有著世代斷裂呢？

雖然本土化、臺灣主體性、去中國化看似環環相扣，來勢兇猛，使得中國文化民族主義者有一種危急存亡之秋의 焦慮。不過，就目前資源分配比例而言，許多從建構中華文化出發的政策仍享有資源，在臺灣社會推行；中學、大學教育與學術研究場域中，中國文化占的資源還有壓倒性的優勢，包括去年國文課綱微調，拉高文言文比例，同時降低臺灣相關題材，以及日前中山醫學大學臺文系停辦，引發一系列臺文系所畢業的學生檢討「臺灣學」學科發展的艱困。凡此種種，使得去政治化的「文化中華」在今日僅能成爲一種浪漫的想像，文化的強勢與弱勢即是政治力的展現，與資源分配、權力競逐不可能脫離干係。

對此，我還沒有能力深論，只能貿然提出簡單的方向，也許能提供「系統外」閱讀《1949禮讚》的幾種可能：《1949禮讚》是回望過去之書，也是眺望未來之書；然而是否爲著眼當世之書，則還有思量討論的空間。面對中國文化長期在臺灣占有較多資源，以及國民黨最近這八年執政中，顛預推行諸多排擠臺灣意識的「再中國化」政策，如若能正視並深刻反省歷史上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的暴力及排他性，而與臺灣學協商、合作、理清資源分配問題，檢視中國文化在臺灣成爲優位文化的過程中，政治與權力如何角力運作，重新考慮「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是否仍適用現代中學教育，而在許多當代議題上，努力與大眾溝通，並發揮批判功用。我想，投身這樣的清理工程，爭取與更多社群對話，在發明新臺灣的議題上，就如楊儒賓教授所期盼的：「中國與東亞不必然再是臺灣外部的打壓力量，它們反而是臺灣內部創造力的泉源」（楊儒賓 2015：41），這樣的期盼，便有開展、創新與實踐的基礎。

引用書目

- 何乏筆。2009。〈1949年與臺灣的跨文化潛力〉，收錄於《1949-新臺灣的誕生》，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頁18-20。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 李筱峰。2007。《臺灣近現代史論集》。臺北：玉山社。
- 若林正文。2014。《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 施懿琳主編。2013。《臺閩文化概論》。臺北：五南。
- 陳弱水。2011。〈「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問題在哪裡？——一個局內人的觀點〉，人籟論辨月刊》第八十六期，頁54-59。
- 陳培豐。2006。《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
- 陳翠蓮。2013。《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臺北：衛城。
- 陳冠中。2015。《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臺北：麥田。
- 莫達明。2010。〈臺灣本土史學的建構與發展（1972-2004）〉，《思想》第十六期，頁55-70。
- 黃錦樹。2015/12/04。〈那麼大的如果，那麼小的拼圖：讀陳冠中《建豐二年》〉，《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204-taiwanreview-the-second-year-of-jianfeng/>。（2016 / 07 / 08 瀏覽）
- 楊儒賓。2015。《1949禮讚》。臺北：聯經。
- 鄧慧恩。2009。《日治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遠、張我軍為中心》。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
- 駱芬美。2015。《被混淆的臺灣史：1861~1949之史實不等於事實》。臺北：時報。